



如何在军备控制领域与中国接触

2021年1月26日

菲奥娜·坎宁汉姆 (Fiona Cunningham)

各位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我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斯坦顿核安全研究员菲奥娜·坎宁汉姆。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欢迎各位参加关于“如何在军备控制领域与中国接触”的专题讨论会。感谢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对本次活动的支持。由于核武器日益成为美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专题讨论会可谓适逢其时。

核军控不再是、也不仅是美中两国的问题。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将处于美中所有对抗的前线，他们也逐渐受到此问题的严重影响；而欧洲将受到北约-俄罗斯核关系以及美中核关系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全球其他地区则将受到美中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的影响。

另外，在危机或冲突中使用核武器以及美中军备扩张并不一定是新风险，但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风险在日益加剧。最明显的是，近年来，美中关系走向竞争态势，使两国均认为对方的核武器更具威胁性。

近年来，美俄军备控制也已被削弱，这影响了中国对美国作为非受控伙伴以及对其未来需要遏止的美国核武库的评估。当然，中国的核现代化也使其核态势的未来发展轨迹受到质疑。中国正在部署更大规模的武器库和新型核能力，这虽然可能符合其不首先使用政策，但为其领导人在未来如何使用核武器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最后，美中两国对核武器的关注不能仅限于评估军备扩张或者在未来冲突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无论是反太空武器、导弹防御，还是进攻性网络能力和常规导弹，非核能力正在以两国不可忽视的方式改变着核格局。除了这些挑战以外，由于双边关系的不对称性，美中军备控制也没有明确的模式。

也许最明显的是，中国的核武库规模比美国小得多，但两国的核战略不同，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将核威慑延伸至盟国。因此，为了克服这一系列挑战，我们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可行且互惠互利的创新性军备控制建议，以推动美中核关系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举办专题研讨会的原因。

这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举行的关于未来军备控制的系列活动中的第二场活动。第一场研讨会于 2020 年 12 月举行，审议了与俄罗斯在军备控制领域的接触。我推荐大家阅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的）《完善核军备控制》的中期进度报告。其中包括涉及美中核关系的两项近期建议。报告的作者，我在卡内基研究院的同事詹姆斯·阿克顿（James Acton），托马斯·麦克唐纳（Thomas McDonald）和普拉奈·瓦迪（Pranay Vaddi）都热烈欢迎各位对相关建议给予反馈。

我将按照发言顺序快速介绍此次会议的与会嘉宾，每位发言者将用五分钟致开幕词，然后进行讨论和观众提问环节。

詹姆斯·阿克顿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联席主任及资深研究员。作为科班出身的物理学家，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先进常规武器升级风险以及军备控制的未来。今天的许多与会者都很熟悉他的研究工作。

赵通任职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晚上，谢谢赵通参加此次会议。赵通最近针对如何在军备控制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发表了许多文章，还发表了有关弹道导弹潜艇和中国对美国导弹防御的看法的专著。

妮古拉·列文豪斯（Nicola Leveringhaus）是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专业助理教授，专门研究东亚国际关系。她目前的研究涵盖三个领域：中国早期核武器历史、当代中印核关系以及区域和全球核秩序形式的责任概念。借此机会我要向各位推荐她有关中国和全球核秩序的书。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研究生院和国际公共政策学院的秋山信将（Nobumasa Akiyama）教授。他所在的时区也已是深夜，谢谢秋山教授。秋山教授的出版物涉及不扩散、日本的核安全和核能。言归正传，现在有请詹姆斯·阿克顿发言。

詹姆斯·阿克顿：

非常感谢菲奥娜。其实深夜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我们的与会发言人，还有菲奥娜。非常感谢你为会议所做的工作。首先，我要向今天将要介绍的论文的合著者普拉奈·瓦迪和托马

斯·麦克唐纳表示感谢，正如菲奥娜所说，这篇研究是我们对于美俄两国军备控制的未来以及如何运用与中国在相关方面取得的进展的一部分思考。

菲奥娜提到的论文可供各位下载，我们想使它成为一篇真正的工作论文。在此邀请各位对文中提到的与本主题相关的建议和其他建议提供反馈意见，我们将在今年年底重新发表之前对其进行完善。

我今天要探讨的具体建议聚焦如何管控美中核关系，特朗普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大规模扩张核武器的可能性表示关切，并提议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实行三边限制，以解决这一关切。

如果看一下美国情报界对中国核武库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裂变材料库存（即作为核武器基本成分的高浓缩铀和分离钚）的观点——你会发现很有趣。国防情报局的评估显示，中国的裂变材料只够制造数百枚核武器的库存——更精确地说，是数百枚核弹头。而美国的库存大约是 4000 枚核弹头。

不仅如此，中国目前似乎未生产更多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因此，如果美国担心所谓的中国逼近势均力敌状态或者中国试图迅速扩张核武库，那么大可不必通过限制中国的核弹头或核武器来直接解决此问题，而可以对终端的裂变材料加以限制。

因此，我们在此提出两项建议。首先，美中可以商定双边禁止生产裂变材料，两国将各自承诺不生产任何裂变材料，并进一步承诺就目标核查措施进行谈判。具体地说，如果任何一国对另一国的合规性有任何担忧，可以尝试协商针对性措施以解决具体关切，而不是协商更广泛的总体核查制度。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讨论这些核查措施的可能内容。我今天不打算讨论核查细节。在双边宣布了禁产裂变材料之后，我们建议美中两国可以交换裂变材料库存数据，特别是两国目前拥有的各类裂变材料的数据。

让我们首先承认，从美国的角度看，这项建议对美国相当有利。美国已经公开宣布其已禁产裂变材料，并公布了裂变材料库存数据。

相反，据信中国已经停止生产裂变材料，但其尚未正式宣布禁产，原因可能是中国希望保留生产更多裂变材料的选择权。我并不想夸大事实，但确实有一些证据表明其正在建设一个钚生产设施，这可以理解为使生产更多钚的选项更具可行性。

因此，一个很明确的问题是，这项建议对中国的好处是什么？首先，我认为对中国而言，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正式谈判、限制核弹头和限制核武器的提议，此项提议更能被接受。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中国必须公布确切的核武器数量和地点供核查，这将加剧中国对其核力量生存能力的担忧。

这一禁产建议可大致了解中国可能拥有多少核武器，但不需要进行那么多的侵入性数据交换或核查。但是其次，这里必须要有交换条件，而这是特朗普政府从未想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可获得的好处来说，一种看法是，中国可以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最有份量的谈判桌上获得一席之地并取得国际威信。但如果我是中方，这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

因此，应该承认必须要有交换条件。作为交换，美国必须为中国提供一些重要好处。在撰写本文时，我们想要表述的不是去猜测中国想要什么，而是尝试与中国谈判者、专家和官员进行对话，然后询问需要付出什么交换代价。

我们提出了我们所认为的管控对中国核武器扩张关切的可行方法。诚邀各位进行内部讨论，并告诉我们需要怎样的交换条件。也许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也许并不能，但是我们并不想猜测结果。在此感谢各位的时间和关注，我把讲台交还给菲奥娜。

菲奥娜·坎宁汉姆：

好的，谢谢詹姆斯。在此我提醒所有观众，如果您想在本场活动上提问，请使用 YouTube 聊天工具将问题发给我们，或将问题发送至推特账号@[carnegienpp](#)。账号字母小写，没有空格。下面请赵通发言。

赵通：

Well，非常感谢菲奥娜。我相信，中美之间的军备控制可以实现互惠互利，这意味着中国可以通过与美国、以及或许与其他国家达成军备控制承诺来更好地捍卫自身利益。但是由于中美两国核能力不对称，我们必须提出一些军备控制措施，并确保这些军备控制建议是公平的，使中美两国从这些建议中相对平等地受益。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在战略军事能力上具有不同优势。美国在战略核武器领域非常强大，但在陆基中程导弹方面较为薄弱，而中国在后一个领域非常强大，但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相对弱势。

因此，一种选择是将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中导条约》所管控的两大类武器设定一个总的限制。《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管控的武器包括洲际弹

道导弹、潜射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中导条约》管控的武器是陆基中程和中远程导弹，也就是指射程在 500 至 5500 公里之间的陆基导弹。

如果我们将这两大类武器结合，我们将形成一个新的军备控制框架，该框架基本上涵盖了射程超过 500 公里的所有陆基导弹以及潜射导弹（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这一新的军备控制框架有若干利好。第一，从这些武器系统的发射器（launcher）数量来看，就会发现中美两国拥有的此类发射器的数量大致相当。

根据基于公开文献的最新统计，中美两国此类发射器的数量都是 600 多。因此，这可使中美两国在未来的军备控制协议中成为平等伙伴，我认为这有助于解决不对称问题，还可避免中国被打上实力不如美国的军事弱国的标签。

第二个利好是，两国都可以灵活地决定如何组合其具体军事能力。为了捍卫其周边安全利益，中国可以继续维持其区域性导弹的优势；而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其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优势，从而保持对俄罗斯的威慑。

第三个利好是，我们也可以将俄罗斯纳入这一协定，并使其成为三边机制。俄罗斯在发射器数量方面也恰好与中美处于类似水平。将俄罗斯纳入其中的好处是，在许多战略安全领域，俄罗斯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利益和关切。作为新参与方，中国可能对参加正式军备控制谈判感到不安，而俄罗斯在与美国进行军备控制谈判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与俄罗斯一道参加谈判可能有助于增强中国的信心。

第四个利好是不涉及导弹和弹头。相较于导弹和弹头来说，这一仅关注发射器的军备控制协议更容易开展核查。同样的，该协议也不区分核弹头或常规弹头。如果要纳入相关核查措施的话，这可以使协议的执行和核查更加容易开展。

最后一个利好是，它在各方希望监管此类武器的尺度方面提供了相当的灵活性。如果一开始各方之间互信水平有限，那么可以从设定数量发展的上限开始。换句话说，各国现阶段可以继续发展相关能力，只不过要设置一个共同的上限。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如果条件具备，各方可以降低这个限制从而将其变成一个冻结能力的协议。

如果一切顺利，各国可以逐步迈向更激进的方案，即设定更低的限制从而使协议成为一个能力裁减协议。我认为这一灵活性也很有用，可为后续更高层次的军控合作提供拓展空间。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个建议并不代表着完美的军备控制方案，而只是提供给二轨或一轨半对话，供专家们开始进行共同的研究、讨论和辩论。这类讨论的参与者当然可以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合理的框架，为开展军备控制合作发现更好的选项。

我认为，关于军备控制模式的联合研究、讨论和辩论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有用的建立信任措施，因为它可以帮助来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对彼此的关切形成更深入的看法，帮助发现未来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菲奥娜·坎宁汉姆：

非常感谢赵通。现在两项建议都已介绍完毕。我们有请妮古拉·列文豪斯继续讨论。

妮古拉·列文豪斯：

非常感谢菲奥娜。感谢卡内基研究院提供的机会。我特别喜欢这份报告。我认为这确实推进了关于这个重要主题的对话。我非常欣赏本报告对裂变材料的关注，詹姆斯在一开始的发言中就提出了关于禁产裂变材料的建议。

互惠互利一词在报告中出现频率很高，我的发言将围绕互惠互利的一揽子计划概念以及建议对中国的潜在吸引力问题。此报告本身讨论的是互惠互利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然后重心倾向于期待中国提出其希望从美国获得什么样的互惠好处，对吗？

詹姆斯，您很清楚，该报告不是打算对中国作出预判，但我想知道让中国自己作出决定是否存在问题。正如赵通合理指出的那样，中国是军备控制方面的新参与方，其对军备控制也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所以这是一个双重难题。

当然，美国不是新参与者，并且幸运的是，在现任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也可能是重建军备控制的热心者和支持者。因此，我认为不仅应该简单地询问中国想要什么，还应该询问美国的要求、美国的期望是什么，两国愿意提供什么，愿意接受什么，并在报告中稍微阐述这一问题。

因此，我认为，从禁产裂变材料的建议来看，对于中国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性的，这意味着如果美国要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实际上可能必须超越国界。

换句话说，美国必须开始考虑盟友。必须开始考虑如何安抚中国的关切，例如中国对日本钚库存的关切。我不想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妄评秋山的研究领域，但这确实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也引出了其他一些问题，例如非《核不扩散条约》成员和印度的核库存相关问题。

在剩下的几分钟里，我希望多谈谈这些建议中所载明的激励因素以及这些激励所基于的假设。我认为其中某些激励具有说服力，尤其是事实上中国可以对美国的库存有进一步了解。但其中某些激励可能没有那么有说服力，部分原因是如今的中国与10年前、20年前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

外交和安全政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各位可能会说，与过去相比，今天的中国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自从1964年成为核武器国家以来，可以说其目前的核力量已达到了其史上最高水平。在国内，核武器也许扮演着复兴的角色，也是新的重要角色。在习近平主席时代，这些武器具有了这种新的政治价值。

我认为对这场讨论更重要的是，通常对中国参与军备控制并采纳这些建议而发出的一些呼吁往往围绕着对核战争的恐惧和不参加会谈的代价、军备竞赛的风险和对于国防支出的影响，以及可能对声誉造成的风险和损害等问题。

我不确定这些激励因素或呼吁在当前中国国情背景下是否会非常有效，因为以核战争风险为例，我并不是说中国不会予以考虑，我认为中国在历史上一直保持一贯态度，直到今天仍认为核战争是可怕的事情，但其并没有直面核战争危险的经历。

这么说吧，这就像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驱动或推进最初的军备控制。请记住，在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印边界战争也在进行。也就是说，中国当时的注意力在别的地方。

在考虑经济健康或经济损失时，也许应该转变思路，考虑有什么经济收益，考虑军备控制对于中国的经济利益是什么？我认为今天我们在看待中国时，不应首先着眼于形象和责任问题，这并无太多吸引力。

我认为，更有吸引力的角度是不稳定性、政治不稳定性的问题。请想一想在福岛核泄露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的表现如何，中国国内对此感到恐慌。因此，我认为围绕核安保和安全的问题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最后，我再快速说一下，到目前为止，尚未真正解决的另一个挑战是关于中国的核地位无足轻重的问题。1973年，在毛泽东与亨利·基辛格进行的一次对话中，当基辛格谈到中国以及苏美军备控制时，毛泽东表明了中国的核立场，他说道“我们只是苍蝇，我们微不足道。”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一点。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考虑到中国仍然非常注意并非常关注无核武器国家的核关切。我的发言完毕。

菲奥娜·坎宁汉姆：

精彩的发言。非常感谢妮古拉。下面有请秋山信将。

秋山信将：

非常感谢。前面三位的发言都非常精彩，好像没什么需要补充的了，我将从日本的角度针对詹姆斯的建议和赵通的想法提出一些评论和问题。因此，我首先要谈的是詹姆斯和其他作者关于如何改善核军备控制以及如何降低军备竞赛升级风险的出色论文。

在阅读报告后，我发现这五项建议非常具体，听起来很切合实际。考虑到三大强国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相当艰难，不适合推进《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条约的谈判，我认为，建议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寻求达成容易取得的目标是个好方法，以便三国能够重新建立合作习惯，通过军备控制实现或重新实现本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

因此，尤其是在针对军备控制和战略稳定的观点出现较大分歧的情况下，美中两国需要立足于取得微小的成功以增进互信，这是落实最具实质性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对话的基础，这实际上也是赵通刚才提出的建议。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禁产裂变材料是一个好的起点。

话虽如此，我对互相禁产裂变材料有两个问题。首先，我想知道如何确保中国的后处理工厂和反应堆专门用于民用目的，换句话说，是否可以遏制中国民用裂变材料用于军事化生产，如何确保这一点？

我想知道中国是否已根据 **INFCIRC/549**（即《钚管理导则》）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报告。如果这能够确保民用和军用裂变材料生产分离，特别是钚生产的分离，我认为这甚至可以是禁产裂变材料的起点。

其次，为了建立获得可信核查的信心，各位是否认为中美两国都需要建立基准，以便就目前拥有多少裂变材料做出初步管制？各位是否认为这有必要？如果没有必要，那么如何才能建立对禁产承诺的信心？

詹姆斯在报告中还建议，为进行核查，中美应利用各自的国家技术手段。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能力达到令人满意的核查要求。这些是我对詹姆斯的建议提出的问题。

接下来，我想请教赵通几个问题。首先，你的建议确实很棒，将中程导弹和战略导弹能力结合以构建新的军备控制框架是一个创新设想。为此我更仔细地进行了思考。我还读了你发表在《当今军备控制》（**Arms Control Today**）的文章，并思考了一些问题。

你在建议中提到，如果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军备控制来寻求和获得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那么中国将不会接受任何交易，中国需要在对等和公平的方案上实现平等。我同意这一看法。

我也同意，并且我确信中国不会真正接受那些会使其陷于不利地位的军备控制模式的构想。因此，我认为这是中美军备控制寻求的非常重要的要素或原则，显然，获得竞争优势通常是军备控制的潜在目标，但与此同时，不应像上届美国政府那样过于追求这一目标。

那么，关于结合中程导弹和战略导弹，我想知道这基于何种战略稳定概念？正如菲奥娜概述的那样，东亚当前战略环境复杂，涉及战略核军控和常规军控之间的交缠，此外，还涉及许多其他能力和新兴技术，包括导弹防御、网络空间等。

各位认为仅将中程导弹和战略导弹纳入军备控制框架是否足够，还是必须寻求更全面的框架，或者仅将这两种核能力从其他能力中分离？我还想知道是否有可能不这么做。此外，赵通在《当今军备控制》发表的论文中还建议美国和俄罗斯应邀请中国观察员参加美（俄）的核查活动。（但是）目前，《开放天空条约》已经崩溃。

鉴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核查活动将再次被延续，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想法，因为这类（邀请中国观察员的）活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进程，可以向中国战略界展示核查的有用性、重要性和透明度，对于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界来说也大有用处，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时，将促进不同战略界之间的相互理解。

因此，我想从日本的角度针对促进美中军备控制提出一些看法。首先，这将决定亚洲的战略稳定。正如我之前所说，核军控与常规军控之间的交缠可能并不明显。如果美国想在该区域保持可信的有效威慑，实际上需要很多支持，也需要盟国的承诺。

因此，如果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盟国深入参与美国最近的有效威慑行为，那么我认为，不可避免地要让这些盟国参与关于战略稳定或军备控制模式的对话或交流。但是，传统上只在核武器国家之间进行核军备控制讨论。因此，要明确美国的亚洲盟国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参与这类对话。

其次，我的第二个看法是，拜登政府现在把重新建立与俄罗斯的军备控制进程视作优先事项，并将与中国的对话视为军备控制议程中的中长期项目。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方面，拜登政府所规划的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主要围绕经济和技术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从我们的角度看，在启动中美核对话或更广泛的战略军备控制磋商与对话时，希望亚洲盟国也能够参与其中。我想向两位发言者请教美国的亚洲盟国参与这种对话的方式或必要性。我的发言完毕，谢谢。

菲奥娜·坎宁汉姆：

非常感谢秋山的全方位点评。由于会议要讨论的内容很多，回答观众提问的时间也有限，我将快速提出一个问题，实际上这是由秋山提出的最后一点引出的，鉴于中美双边关系中还有许多其他紧迫问题摆在两国领导人面前，对于他们来说，军备控制占多大优先级？

那么，在美国总统和中国总书记没有将军备控制作为个人优先事项的情况下，美中两国能否继续推进赵通和詹姆斯提出的这类建议呢？我将请与会嘉宾依次发言，首先从詹姆斯开始，然后依次评论，再进入观众提问环节。

詹姆斯·阿克顿：

谢谢菲奥娜。秋山和妮古拉刚才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在此我不对全部评论进行回应，而是试着回答一些关键内容。对于刚才提出的问题，即这一事项有多大的优先级，我认为目前这显然不是中国领导人的优先事项。拜登政府与中国落实军备控制会被视为多大的优先事项还有待观察。

我认为，实际上，如果美国总统不亲自研究此事，其肯定不会成为优先事项。如果他亲自研究，成为优先事项的概率仍然不高。但我认为，美国总统必须与习近平主席直接交流，以便使此议题有机会成为优先事项。

我认为，在与盟国互动的问题上，美国与盟国协作至关重要。我认为，盟国是否直接参与谈判取决于建议内容。如果建议限制了日本、中国和美国的裂变材料，那么日本显然必须参与其中。

我在此提出的纯粹是美中双边协议。因此，只需美国和中国就细节进行谈判，但这绝不排除在任何双边谈判之外与盟国开展密集磋商。实际上，我认为欧洲开展的中程导弹谈判就是很好的例子。

最后我想说，由于我认为秋山的问题提出了分离中国民用和军事后处理方案，在此我想提几点看法。我认为中国距离拥有功能性民用后处理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为民用目的建造的中试厂并未运行。

中国正在与法国谈判在华建造大型后处理设施。如果中国要这样做，我能想到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就像日本六所村后处理厂一样，它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但是，我们讨论的是至少十年后的事情，坦率地说，我怀疑这个设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达到运行状态。

因此，我认为这可能是真正问题，但我仍然会继续推动中国参与，并试图达成禁产，即达成如下共识：如果中国开启民用后处理厂，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

菲奥娜·坎宁汉姆：

请赵通发言。

赵通：

我简单说几句。我建议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中导条约》结合起来，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军备控制模式，以便中美专家开展实质性的研究和辩论，否则对话将非常空洞。提供一些具体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和充实讨论。

我认为，此进程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彼此的关切和彼此政策思想中的细微差别。这个具体的军控建议本身并不一定要成为将来两国之间军备控制框架的全部内容。它可以与其他建议同时落实，例如詹姆斯提出的禁产裂变材料建议等。

关于美国盟国的参与，我认为令美国盟国参与美中战略稳定问题的讨论相当重要。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美国一直无法在国内推进“不首先使用”政策或“唯一目的”政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盟国担心其安全受到损害。

因此，我认为需要将讨论范围扩大至美国盟国。如果中国能够向美国盟国提供一些安全保证，例如承诺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这将有助于解决美国盟国对中国的安全忧虑，并可能有助于说服这些盟国放弃反对美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或“唯一目的”政策并与中国建立更明确的战略稳定关系。这将使中国受益。我认为这种收益是促使中国认真考虑这种措施的激励因素。

最后，正如詹姆斯所说，在美国和中国对待军备控制的优先级问题上，军备控制目前似乎不是中国领导人的优先事项。但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优先事项之一，因为中国现在也面临着重要的发展经济的需求。中国正在削减各项支出以支持疫情期间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当下和未来确实有节约支出的明确需求，而军备控制领域的合作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稳定与美国的关系，为双边关系加装防护栏，以避免发生成本高昂和颇具风险的军备竞赛。中国希望总体上保持更加稳定的双边关系，而军备控制合作可以成为中国增进在此领域利益的重要工具。但是，正如詹姆斯所说的，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与中国的领导人直接接触，与中国体制中唯一重要的人接触。

菲奥娜·坎宁汉姆：

时间紧张，妮古拉和秋山，下面请你们各用一分钟时间发言。

秋山信将：

谢谢。我希望中国决策者的想法与赵通类似。这样确实会有帮助，但是现在我可能会谈一些现实内容。关于宣示性政策，我认为，由于美中两国之间或中国与美国盟国之间当前缺乏信任，因此双方的宣示性政策目前在推进军备控制方面可能没有那么有效。

因此，我认为在讨论宣示性政策之前，还必须就战略问题进行更多对话。此外，如果提高透明度，特别是提高中国一方宣示性政策和能力发展之间的一致性方面的透明度，我认为外界对中国政策或中国承诺的信任将大幅提高。

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重要的可能是讨论如何提高双方（美国和中国，也许还有日本）宣示性政策和落实这些政策的透明度。

菲奥娜·坎宁汉姆：

请妮古拉发言。

妮古拉·列文豪斯：

我也简单说几句。我同意各位之前的判断，我认为此议题不是多么优先的事项，但我想说的是，如果各位回顾中国过去参加谈判的实例，当然，这与重新创造谈判条件无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外界压力起作用的情况下，事情通常进展顺利，中国也不想被视为在某种程度上错失良机。

因此，如果美国认真对待双边协议，无论是按照报告的表述或是赵通提出的一些好建议，在我看来，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只需要与中国达成协议。

如果美国开始与其他核武器国家讨论类似的双边建议，也许会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因此，要么必须就为何只需要与中国达成协议给出合理解释，要么需要跳出中国进行思考，考虑是否会对中国的参与产生压力。

菲奥娜·坎宁汉姆：

非常感谢所有与会嘉宾的发言。下面回答观众提问。首先感谢观众们提出的优秀问题。我把京都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平木中西（Hiraki Nakanishi）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布莱恩·拉丹斯基（Brian Radinsky）的问题合并在一起，这个问题与后《中导条约》框架有关。

请赵通和妮古拉回答这个问题：针对有中国参与的后《中导条约》框架进行谈判的利好在哪里？包括中程核力量范围内的三边建议以及赵通提出的结合战略核力量和中程导弹力量的建议。妮古拉可以就在三边和双边背景下开展谈判的动机性问题发表评论。赵通，请你先发言。

赵通：

如果从中国的角度看三边的中程导弹协议，那么不仅需要考虑陆基中程导弹，还需要考虑空基和海基导弹。

理论上可以将这三类武器结合在一起，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能力不对称问题。但这不太容易，因为美国在海基和空基方面的优势巨大，（即使考虑到中国在陆基方面的优势也）很难将中国和美国作为平等伙伴纳入这类协议中。这也是为何我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结合这些系统。

总的来说，我认为，只要某种方式能够对各方公平、平等和可被接受，就是可考虑的。事实上存在不同的权衡取舍和搭配方式，存在多种可能的组合方案，而我的建议无疑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选项。

菲奥娜·坎宁汉姆：

谢谢赵通。请妮古拉发言。

妮古拉·列文豪斯：

我认为双边和三边协议都有问题，并没有一个方案绝对优于另一个。我认为就像赵通说的那样，如果能适当地归类这些武器，降低不对称性，中国也许会参与核军控。但我仍然认为，考虑政治激励因素很难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中国参加这种谈判有什么好处似乎很不明确。

我回想到，自《中导条约》谈判、再到条约崩溃以来，中国的注意力远超出双边和三边框架问题，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各位必须关注联盟问题。这里指的是北约，我认为在谈判中很快会出现难以处理的状态。

我认为不管是双边还是三边都不是特别好的未来路径，除非可以提供足够充分的理由，或者至少有足以推动其在中国取得进展的国内理由。

菲奥娜·坎宁汉姆：

感谢妮古拉和赵通。Ryan Fedasiuk——如果我念错了你的名字我感到抱歉——在推特提问：“是否仍然应该致力于限制弹头总数或仅是侧重于限制裂变材料生产？如果应该寻求限制核弹头，那么美国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五年期延期将产生哪些作用？而在涉及中国时，美国还有哪些特别的谈判手段？”下面请詹姆斯回答这个问题。

詹姆斯·阿克顿：

谢谢菲奥娜。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之所以提出裂变材料建议恰恰是因为我们认为当前对中国核力量的限制完全不切实际。我们的建议面临很多挑战。我不希望对此盲目乐观，但是在我看来，目前限制中国核力量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

因此，从长远来看，我支持针对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性和非战略性弹头施加单一限制的观点。这是一个宏大的长期目标。我支持目前将注意力分别放在美中和美俄两个分开的轨道上。正如赵通所言，围绕美中两国有许多建议，我们的建议只是其中一项。就像赵通所提到的，关键是有没有哪一项具体的建议能够被接受并取得进展。

关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问题，事实上，该条约从未发挥影响。我明确认为，中国重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因为其认为该条约对美国进攻性力量施加了限制，特朗普政府建议试图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作为条件，换取中国参加三边谈判，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不曾有效也不会有效。

这就是特朗普政府最终放弃这一特定关联的原因。他们维持了其他关联，但放弃了这一特定关联。中国参与的关键是中国领导人是否认为与美国的双边军备控制符合中国的利益。能否就此提出一些互惠互利的建议。今天的许多讨论就是在关注什么样的建议能达到这一目标。

今天围绕针对中国的潜在激励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我要重申如下看法，中国利益的界定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中国领导人。我再次鼓励中国的同行和对话者就中国对军备控制的需求进行对话。

菲奥娜·坎宁汉姆：

非常感谢詹姆斯。很遗憾，会议已接近尾声，现在回答最后一个观众问题，然后请每位与会专家做一到两分钟的总结发言。

最后一名提问者是马来亚大学的 Collins Chong，他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能将经济制裁和制裁威胁用作打破美中军备控制僵局的谈判筹码之一？如果是的话，这可能会对该区

域盟国利益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国家可能会被当作中国反击报复的平台，以表明其不遵守美国正在采取的鼓励中国开展军备控制的策略。”

有请秋山回答这个区域性问題，如果希望看到军备控制取得进展，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盟国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秋山，请你简要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请各位总结发言。

秋山信将：

谢谢，我认为请赵通回答这个问题更好。我觉得核政策方面的经济制裁实际上可能不会影响中国。此外，从盟国的角度看，冷战、美苏对抗和中美对抗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美国盟国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中国。

因此，难以真的与中国一刀切脱钩。我认为经济制裁对既定军备控制议程的影响很小。谢谢。

菲奥娜·坎宁汉姆：

非常感谢秋山。现在开始总结发言，顺序是妮古拉、詹姆斯、赵通和秋山，发言时间是一分钟，请各位就还想讨论的内容发言。

妮古拉·列文豪斯：

非常感谢。我只想补充一点，即中国对军备控制的态度，我曾说过中国对军控持相对怀疑态度，其传统上当然一向表示美国和俄罗斯负有减少核武库的主要责任，因为美俄两国拥有最大规模的核武库。因此，中国的观点是现在参与军控进程为时尚早。

我认为这场讨论也显示了其中的困难。不仅是为时过早的问题。论点是难以设计诱人的建议激励中国参与军控谈判。我现在思考的是，如果中国当前逻辑是认为参加军控为时过早，而其他两个国家（美国和俄罗斯）负有主要责任，如果中国确实会面临更多压力，如果有更加成熟的可以使得中国参与谈判的建议，那么问题很快就变成其他国家何时参与。

印度、巴基斯坦、法国甚至朝鲜何时参与军控？我认为需要做出回答，但在该领域并未开展多少对话。我认为有必要开始思考中国以外的事项，就像在考虑中美双边问题时，即使只有两方参加谈判，我们要思考的也绝不止是中美两个国家。

菲奥娜·坎宁汉姆：

有请詹姆斯发言。

詹姆斯·阿克顿：

谢谢菲奥娜。我最后想谈两点。首先，中国历史上一般不愿意参加军备控制，但是一旦参与，就会很认真地参与。除了参与众所周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外，还有中国与俄罗斯达成的两项相当严肃的协定，至少我知道有两项。

有一项是限制边界区域常规部队的协定。还有一项是中俄发射通报协定。我认为这两项协定都很严肃。我着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有先例可循。正如我所说，要让中国参与很困难，但是中国一旦参与，会认真参与。

关于中国的参与动机，我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我不知道哪一种正确，或者是否任何一种都正确。一种是妮古拉的观点，那就是将激励扩展到地域范围。你提到了中国关注的其他国家，无论是日本、印度还是其他国家。

另一种类似于垂直思考方式，各位推断中国不想正式宣布禁产裂变材料的原因也许是担心诸如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高精度常规武器，也就是会影响中国核力量的这类事物。因此，在扩展激烈问题时必须涵盖美国的相关军事能力。

我不知道其中哪一种方式对中国更具吸引力，也许都会有吸引力。我想指出，关于如何制定建议，如何使军备控制对中国具有吸引力，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

菲奥娜·坎宁汉姆：

谢谢詹姆斯。最后有请赵通和秋山发言，各自的发言时间是一分钟。

赵通：

谢谢。我想指出的一点是，我认为军备控制可以对中国有利，但中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外界无法寄希望于胁迫中国或迫使中国参加军备控制，因此制裁行不通。合作伙伴必须解决中国的关切等问题。

我认为中国参与军备控制存在两个障碍。一种是中国传统思想，包括传统上对保密和不透明的坚持以及某些范围内对军备控制的一贯怀疑。只有当中国最高领导层支持和愿意参与军备控制时，这种障碍才能消除。因此，需要与最高领导层接触互动，这一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其次，当下还需要开始与中国进行实操层面的互动，探索具体的可能选项。如果有了政治支持和意愿，那么就需要探讨具体措施来解决问题。为此，需要就具体选项进行专家级的讨论。这种讨论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三边的或多边的。这种具体的讨论有助于为未来进展铺平道路。

菲奥娜·坎宁汉姆：

谢谢赵通。下面有请最后一位发言者秋山。

秋山信将：

谢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或者美国、中国或盟国应立即开始讨论军备控制的重要性。正如赵通所说，我们可能必须对军备控制的重要性以及军备控制对每个利益相关方和区域安全的利好取得共同理解。

因此，在讨论中，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确实需要讨论各自战略利益，以及如何评估双方能力和运用政策，以提升透明度和信心。

同时，我认为，正如詹姆斯建议的那样，禁产裂变材料也许是达成容易实现的成果的重要和实用步骤，这将是进一步迈向实质性进展的非常重要的步骤。非常感谢。

菲奥娜·坎宁汉姆：

非常感谢所有嘉宾，感谢我们优秀的观众提出的优质问题。今天早上我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显然，我们仍然要做很多工作以了解中国的想法以及可能在军备控制领域与中国接触的方法。由于时间有限，有些观众的问题没来得及回答，我对此表示抱歉。观众们还提出了关于新兴技术和核弹头验证的一些很好的问题。我确信，嘉宾很乐意通过电子邮件回答各位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很荣幸主持这次讨论，特别感谢艾林·迈克劳林（Erin McLaughlin），托马斯·麦克唐纳和卡内基活动团队，为了这次出色的活动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再次感谢日本驻美国大使馆。非常感谢各位的精彩讨论。下次活动再见。